

毛泽东倡导党员干部“做老实人”

□ 王颖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始终倡导党员干部“做老实人”。正是在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力倡导下,“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精神财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脚踏实地前行。

忠诚老实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一直传承至今,但它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尽相同的内涵。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需要,对传统文化中关于忠诚老实的人格要求进行批判继承,扬其精华、弃其糟粕,并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新赋予它崭新的内涵。

毛泽东所倡导的老实人是实事求是的人

毛泽东较早提到“老实”与“科学”的关系,是在1938年8月2日对抗大毕业学员的一次讲话中。他强调:中国历朝以来有正派、不正派两条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明君用人在贤,昏君用人在亲,所以用干部要注意。要反对“吹牛拍马”,反对“天下第一”。他又说:“要讲老实,有多少讲多少。世界上的事情都是老老实实的。地球绕太阳也是老老实实,是依规矩走的。规矩亦名科学”,“这里讲‘规矩’‘科学’‘正派路线’,反对历朝来的不正派路线,一句话,就是老老实实”。

毛泽东所倡导的老实人,是尊重科学的人,也就是克服了主观主义、具有马克思主义态度的人。这种人能够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观

点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实事求是的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用一副对联形象描绘了没有科学态度、不老实的人:“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他向全党提出忠告:“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吧!”“凡真理都不装样子吓人,它只是老老实实地说下去和做下去。”毛泽东倡导的老实人,对“权威”对上级不迷信不盲从,勤于思考,有自己的是非判断,能够坚持真理,反对谬误,敢于斗争。他指出:“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

毛泽东倡导的老实人,本质上是实事求是的人。毛泽东自己后来说,老实的“实”即谓实事求是。由于具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精神,毛泽东倡导的老实人的主体不是以顺从的方式逐渐消融于客体之中,而是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正确认识、把握和改造客体。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具有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也必须是一个老实人。

毛泽东所倡导的老实人是忠于党和人民的人

毛泽东认为,老实人不仅要具有实事求

是精神,还要忠于党和人民。而忠于党和人民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个人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顾全大局。他将个人主义者、宗派主义者归为不老实之列,说:“这种人闹什么东西呢?闹名誉,闹地位,闹出风头。在他们掌管一部分事业的时候,就要闹独立性。为了这些,就要拉拢一些人,排挤一些人,在同志中吹吹拍拍,拉拉扯扯,把资产阶级政党的庸俗作风也搬进共产党里来了。”毛泽东旗帜鲜明表达自己的观点:“我想,我们应该是老老实实地办事;在世界上要办成几件事,没有老实态度是根本不行的。”

毛泽东肯定过的老实人,都具有以党和人民利益为重、顾全大局的突出特点。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提名罗荣桓为红四军前委委员并建议任命他为第二纵队党代表,后来毛泽东解释说:“为什么让他当党代表呢,就是因为他老实。”毛泽东多次称罗荣桓为“老实人”,十分器重他,说:“我喜欢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1963年,毛泽东得知罗荣桓去世的消息后十分悲痛,说:“这个同志有一个优点,很有原则性,对敌人狠;对同志有意见,背后少说,当面多说,不背地议论人,一生始终如一。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原则性强,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作用。”毛泽东还写下“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的诗句悼念他。党内还有不少干部被毛泽东称过“老实人”,他们都是有大局观、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关系问题上处理得比较好的干部。

毛泽东倡导的老实人,忠于党和人民,忧

党忧民,不仅具有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还富于不怕困难、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毛泽东说过:“我们国家要有很多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毛泽东倡导树立的模范典型,都是热爱党和人民、诚心为人民服务的老实人。1963年,毛泽东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雷锋具有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无私地对社会进行奉献,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倡导的老实人格的精神内核——对党和人民忠诚。1964年,毛泽东发出“学大庆”的号召,“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的“三老”作风就是大庆经验很重要的一条。石油工人王进喜用一言一行践行了“三老”作风。他埋头苦干,获得“铁人”的称号,且功高不自傲,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他多次表示:“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当人民的孺子牛。我从小放过牛,知道牛的脾气,牛出力最大,享受最少,我要老老实实地为党和人民当一辈子老黄牛。”毛泽东赞赏这样的老实人,他71岁生日时,用自己的稿费宴请了为数不多的客人,其中就有王进喜。

在毛泽东这里,老实人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为人类最进步的事业而奋斗,自觉地按照客观规律规范自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的人生意义和价值。

1956年,党的八大第一次将“对党忠诚老实”作为党员的义务写入《党章》,从此,这一条成为《党章》对党员义务的重要要求。

长征路上的一个春节

□ 贾永

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遵义会议之后的红军依旧是危机重重,必须尽快杀出一条血路,突出重围。

1935年1月20日,中革军委从遵义转至桐梓县城,随即下达《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地域定在宜宾、泸州之间。毛泽东的设想是,趁着年关临近,川军江防麻痹、国民党追击军尚在途中之际,避其锋芒,悄然过江,摆脱围追堵截。

28日拂晓,战斗在蒙蒙细雨中打响。战至黄昏,双方仍呈胶着之势。红军发现,川军不是情报中所说的两个团,而是两个旅,另有两个旅的增援部队还在源源而至。并且,原本以为像黔军一样一击即溃的川军战力丝毫不亚于中央军,轻重武器装备甚至优于中央军。“歼灭战”成了“拉锯战”,人均仅有20发子弹的红军陷入危机。

眼看短时间取胜无望,中央政治局连夜命令停止与敌人纠缠,暂时放弃北渡长江计划,避实就虚,西进川南。29日拂晓,红军从土城浑溪口、元厚等渡口迅速渡过赤水河。

部队撤至四川叙永县城南79公里处的石厢子时已是大年三十的傍晚。这里与贵州毕节县大渡乡和云南威信县水田寨接壤。雄鸡报晓,三省可闻,故而三地交汇处统称为“鸡鸣三省”。当时的石厢子是一个仅有400多人的小村庄。地处大山深处,老百姓的日子苦不堪言,连除夕之夜的爆竹声也是稀稀拉拉。警卫员好不容易弄来一碗腊肉,被毛泽东送给了伤员。

大年初二,部队向云南威信境内转移。当天晚上,在水田寨一栋因门窗雕有花草虫鸟图案而闻名的“花房子”里,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博古交出了装有文件、材料、公

章等象征着中央最高“权力”的几副挑担。

那个春节,重要会议一个紧接一个。大年初五,政治局在大河滩召开会议,正式通过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第二天,中央政治局在威信县城所在地扎西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新的战略方针,会议决定改变原定北渡长江的计划。会议同时决定,对中央红军进行整编,彻底改变长征以来“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的局面。

大年初六的政治局会议,开了一个通宵。凌晨,由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签署的《关于各军团的缩编命令》随即发出。中央红军由30个团缩编为17个团,机关和后勤人员大幅度精简,充实基层;运输队、掩护队、供给部等机构的大部分人员,以及司号员、理发员、炊事员等等,大都编入作战连队,

红军师长当团长,10个连长一个班。

这是一次脱胎换骨的精简。凡两个人抬不动的东西,个人抬不动的东西都要甩掉。早已成为部队沉重负担的造币机、造弹机、印刷机、磅秤、铸银模子等笨重机器和器材则一律处理掉。丢掉了“包袱”,实现了“消肿”,部队面貌焕然一新。趁着国民党几十个团匆匆在长江南岸布防阻拦,贵州兵力空虚之际,毛泽东再度挥师黔北,杀了敌人一个回马枪。红军先头1个团先敌抢渡二郎滩,成功掩护部队于2月18日至20日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取桐梓、夺娄山关、重占遵义城,5天内歼灭和击溃蒋介石嫡系吴奇伟部2个师8个团。

本版内容摘自“人民网”,请原作者或有关单位联系我们,以奉稿酬。

